

“帝国怀旧”、地缘政治机会与土耳其外交的转折

曾向红 张峻溯

摘要 当前土耳其研究出现了强调奥斯曼帝国历史文化因素的“帝国转向”。针对 2016 年后土耳其在周边地区“四面出击”的外交新态势，本文尝试从国内社会思潮演变、区域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两方面予以分析。在奥斯曼帝国遗产复兴、国内外环境出现极大不确定性、保守派政治势力趁机引导的背景下，土耳其国内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怀旧意愿不断增强，并最终产生“帝国怀旧”情绪，促使土耳其外交重心逐渐转向原奥斯曼帝国的领域范围（包括中东、北非、高加索等地区）。与此同时，周边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为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政府实施“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机会窗口。在“帝国怀旧”和地缘政治机会的共同驱使下，土耳其积极介入地区事务，试图在原奥斯曼帝国领域范围内重塑其大国影响力。“帝国怀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埃尔多安的执政基础，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或将进一步加剧土耳其内政外交的既有困境。

关键词 土耳其外交 奥斯曼帝国 怀旧 地缘政治 埃尔多安 中东变局

2016 年“7·15”未遂军事政变发生后，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冒险特征凸显。这一时期，土美、土欧、土俄关系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不过，土耳

* 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峻溯，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兰州 730000）。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项目批准号：21VGQ010）的阶段性成果。

其却对此不以为意，反而开始谋求在周边地区^①实现外交突破。在中东、北非、高加索等地区，土耳其干预了一系列危机和冲突，表现出盲目扩张、“四面出击”^②的外交新态势。2017 年卡塔尔断交危机爆发后，土耳其迅速推出海湾地区的驻军计划，借此为其逊尼派盟友提供“国际支持”。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不顾北约及其盟国劝阻，接连对叙境内目标发动包括“和平之泉”在内的四次越界军事行动。在利比亚战场，土耳其不惜违反武器运输禁令，向利比亚政府军提供军事援助。2020 年纳卡地区冲突爆发后，土耳其不断向阿塞拜疆提供军事支持，高调介入高加索地区事务。

总的来看，2011 年中东变局后土耳其外交已经出现相当大的转变，其外交政策愈加偏离“欧洲化”而回归“中东化”和“本土化”。^③ 不过，相较于最初仅关注中东地区事务，2016 年后土耳其外交却凸显“冒险主义”倾向，外交着力点也开始向北非、高加索、巴尔干等周边地区转移。在此过程中，其外交政策手段之强硬、态度之激进，似乎远超土耳其既有的能力范围。就其国家实力而言，冷战后土耳其综合国力虽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跃升，但其归根结底仍然是一个地区大国或可称为“中等强国”，^④ 且目前土耳其的国际影响力与“中等强国”外交的行为特性仍具有一定的差距，^⑤ 更无法达到其所宣示的“全球性大国”的实力标准。然而，2016 年后土耳其外交却一反常态，显示出在周边地区“四面出击”、“盲目冒进”的特点。这不仅无法与土耳其的实力和地位相匹配，更使其在地区和国际层面陷入四面树敌的危险处境。^⑥ 那么，为什么 2016 年以来土耳其外交会脱离自身“中等强国”的实力

① 周边地区通常特指与该国在地理、历史、战略价值等方面有着紧密联系的地区。根据达武特奥卢在《战略纵深》一书中的表述，土耳其的周边地区具有“地理纵深”和“历史纵深”的特征，大致包括原奥斯曼帝国的领域范围（中东、北非、“非洲之角”等地区）和高加索—里海—中亚走廊。参见 Ahmet Davutoğlu, *Stratejik Derinlik*, Küre Yayınları, 2009; Ahmet Davutoğlu, “Turkey’s Foreign Policy Vision: An Assessment of 2007”, *Insight Turkey*, Vol 10, No 1, 2008, pp. 77-96.

② 有研究认为，在土耳其崛起过程中，分别受到东（与伊朗关系）、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西（与美欧关系）、北（与俄罗斯关系）四组关系合成作用的张力影响，这说明土耳其外交具备“四面出击”的客观条件。参见丁工：《中东变局与土耳其崛起的前景》，《外交评论》2013 年第 6 期，第 150—152 页。

③ 关于土耳其外交的转型与回归，参见李亚男：《转向的土耳其：雄心与困境》，《现代国际关系》，2017 年第 7 期，第 6 页。

④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Basic Books, 1997, pp. 130-135.

⑤ 丁工：《土耳其中等强国外交的现实性和可能性》，《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 年第 9 期，第 96 页。

⑥ Aylin Gurzel and Eyüp Ersoy, “From Regionalism to Realpolitik: The Rise and Fall of Turkey as a Middle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in Giampiero Giacomello and Bertjan Verbeek, eds., *Middle Powers in Asia and Europe in the 21st Century*, Lexington Books, 2020, pp. 131-132.

和地位，出现在周边地区“四面出击”的转折？这是本文希望论述的主要问题。

一、既有研究述评与分析框架构建

（一）现有研究土耳其外交转变的三大视角

土耳其地跨欧亚、面向中东，地缘战略位置的特殊性与重要性使得国内外学者对其外交政策变化极为关注。针对土耳其外交在 2011 年后所出现的巨大转变，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三种视角。

第一种视角着重强调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历史性。基于这一视角，诸多研究认为土耳其外交发生了“轴心之变”（Axis Shift），即偏离融入西方的进程，而重新转向东方。^① 长期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始终面临来自中东和欧洲两个方向的张力，这种外交窘境难以调和。^② 有学者认为，土耳其对于“向西”抑或“向东”的战略选择，取决于国际形势的影响和国家统治精英的战略抉择。^③ 其实这是将“轴心之变”这一视角下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国际和国内因素的二分。

而强调国际因素的观点指出，2007 年后法德两国保守派政党上台使欧盟内部对土耳其入盟的反对声浪加大，甚至提出以构建土欧“特殊伙伴关系”代替给予土耳其“欧盟准成员国”的身份地位，激起了土耳其的强烈不满。^④ 2011 年中东变局后，安全诉求和地缘政治抱负成为土耳其外交转型的主要动力。^⑤ 在入盟遥遥无期的情况下，土耳其积极介入中东地区新秩序的构建，试图将自己打造成中东地区的“中心国家”。与此同时，地区局势的持续动荡也为土耳其打开了“机会之窗”，中东权力格局的变化为土耳其外交“由

① Ekrem T. Başer, “Shift-of-axis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urkish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Before and During AKP Rule”, *Turkish Studies*, Vol 16, No 3, 2015, pp 291-309.

② Philip Robins, “Turkey’s ‘Double Gravity’ Predicament: The Foreign Policy of a Newly Activist Pow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9, No 2, 2013, pp 381-397.

③ 管涛：《从历史角度看土耳其的多边主义战略》，《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 年第 1 期，第 56 页。

④ Rabah Aissaoui, “History,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The Issue of Turkey’s Acce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French National Press”, *Journal of Southern Europe and the Balkans*, Vol 9, No 1, 2007, pp 10-14.

⑤ 李秉忠：《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动力：安全诉求和地缘政治抱负》，《当代世界》，2018 年第 11 期，第 56—60 页。

西向东”的转变提供了外部动力。^①有研究则强调土耳其国内因素发挥了主导作用。2002 年上台的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下文简称正发党）不断利用国内政治改革进程削弱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派势力，推行伊斯兰主义政策，^②以此实现土耳其外交偏离“欧洲化”、回归“中东化”的转向。正发党政府利用外交政策“由西向东”转型，尝试塑造土耳其国内选民的政治认同，迎合保守派穆斯林群体对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回归感”，从而为正发党赢得选举优势，巩固其执政的民意基础。^③

第二种视角主要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中有关规范、身份与国家外交政策的分析。^④这一视角下的诸多研究认为，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土耳其“国家身份之变”。^⑤自 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凯末尔主义主导下的土耳其一直将实现“欧洲化”与跻身西方“文明世界”视为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然而，受制于奥斯曼帝国历史和伊斯兰文化的深厚影响，土耳其一直在“欧洲国家”与“中东国家”、东方与西方等诸多国家身份之间摇摆，这构成了考察土耳其内政外交的一条主线。长期以来，欧盟在对待土耳其欧洲身份认同上的态度时有反复——既不愿意接纳土耳其，又不愿意抛弃土耳其，^⑥导致土耳其不得不对其外交政策进行反复调整。时任土耳其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就曾指出：“土耳其的国家身份有两重维度，即东方和西方……土耳其应该是东方和西方不可或缺的力量。”^⑦不过，在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土耳其国内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派势力强大，因此其国家身份主要表征为对“欧洲国家”身份的追求。阿卡姆·阿里认为，正发党上台以来，土耳其国内政治中伊斯兰势力出现复兴态势，温和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与世俗主义意识形态相互争斗，故土耳其一直处于从“欧洲国家”到

① 李秉忠：《“中东波”以来土耳其外交的调整》，《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4 期，第 52—54 页。

② 参见李智育：《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权的外交政策成因分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 年第 5 期，第 60—61 页。

③ Esen Kirdiş, “The Role of Foreign Policy in Constructing the Party Identity of the Turkish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KP)”, *Turkish Studies*, Vol. 16, No. 2, 2015, pp. 178-194.

④ 参见袁正清：《建构主义与外交政策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9 期，第 12—13 页。

⑤ 这一观点可参见唐志超：《身份危机与中东大变局》，《世界知识》，2018 年第 24 期，第 27 页。

⑥ 张学昆：《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与入盟问题》，《欧洲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52—53 页。

⑦ 参见 Hasan Kösebalaba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slam,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 121.

“伊斯兰国家”身份转变的过程中。^①这种对“伊斯兰国家”身份的追求旨在将土耳其塑造成中东地区逊尼派穆斯林的“潜在领袖”。^②2010年后，在入盟谈判推迟和中东地区大变局的影响下，土耳其逐渐在外交政策中凸显其混合身份（hybrid identity），即“地处中东的欧洲国家”和“欧洲的中东国家”。这不再是对“桥梁”这一被动身份的固化，而是体现出土耳其主动发挥自身影响力、介入地区事务的强烈意愿。在混合身份的驱使下，介于中东与欧洲之间的“桥梁”身份被视为一种无形的外交资产，土耳其试图以此扩大地区影响力。^③

在土耳其“国家身份之变”的视角下，一些研究深入考察了土耳其现代化进程和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困境，指明土耳其激进追求政治民主化、社会世俗化与原生社会中出现的“现代性危机”之间的关系，^④这为我们从“现代性”视角解读土耳其外交转变提供了新的思路。福阿德·开曼和塞布内姆·古穆斯库认为，推进国内政治改革且奉行世俗化政策的土耳其能够在欧洲一体化及中东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然而，随着土国内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兴起，强调包容性的世俗身份被日渐凸显的伊斯兰身份所掩盖，直接导致了土耳其在库尔德人问题和中东难民问题上的强硬态度。^⑤

第三种视角主要从国家实力对特定国家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的角度予以分析。相关研究认为，“国家地位之变”导致了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变化。这种观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土耳其国家角色地位的变化；^⑥其二，土耳其国家实力地位的变化。^⑦

① Akam A. Ali, “Constructivist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Turkish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Research*, Vol 2, No 1, 2019, p 12.

② Metin Heper, “Islam, Conservatism, and Democracy in Turkey: Comparing Turgut Ozal and Recep Tayyip Erdogan”, *Insight Turkey*, Vol 15, No 2, 2013, pp 141-156.

③ 参见 Bahar Rumelili, “Turkey: Identity, Foreign Policy, and Socialization in a Post-Enlargement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33, No 2, 2011, pp 243-246.

④ 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胥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5—10页；哈全安、周术情：《土耳其共和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243—261页；刘云：《土耳其政治现代化思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5—84页。

⑤ E. Fuat Keyman and Sebnem Gumuscu, *Democracy,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urkey: Hegemony through Transform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 139-142.

⑥ Bülent Aras and Aylin Gorener,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The Ideational Bases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s Foreign Policy Activism in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12, No 1, 2010, pp 73-92.

⑦ Mustafa Aydin, “Twenty Years Before, Twenty Years Afte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t the Threshold of the 21st Century”, in Tareq Y. Ismael and Mustafa Aydin, eds., *Turkey’s Foreign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A Changing Role in World Politics*, Routledge, 2003, pp 3-26.

土耳其前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曾坚持认为土耳其应该是“全球性国家”而非西方学者所称的“桥梁国家”。^①对角色地位诉求的变化使近年来土耳其外交扩张性凸显。莱尔纳·雅尼克认为,土耳其历史和地理的特殊性不仅赋予其区域“和平缔造者”和“中心国家”的角色地位,而且也把土耳其描绘成一个实力不断上升的国家。这种“实力的上升性趋势”激励土耳其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积极行动,以实现其外交政策与“中心国家”角色相符的目标。^②不过,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中等强国”,虽然土耳其声称自己是“中心国家”和地区秩序的“领导者”,但一些学者却指出,这其实是土耳其领导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高估了土耳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和地位。^③从国家实力变迁的角度看,21世纪以来,土耳其的综合国力大幅上升,尤其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土耳其影响力能够覆盖中东甚至是非洲东海岸地区,这为土耳其追求“全球性大国”目标提供了经济层面的激励。^④尽管如此,土耳其国家实力的提升远不能为其追求“全球性大国”、“中心国家”等地位诉求提供足够的支撑,反而会使土耳其外交面临极高的政治风险,加剧土耳其经济实力的敏感性及国家影响力的脆弱性。^⑤

(二) 对现有研究的反思及其启示

总的来看,上述三种视角在解释土耳其外交转型时各有侧重,对土耳其外交的转变也做出了颇具理论性和前瞻性的分析。第一种视角强调历史视野在研究土耳其内政外交转型问题上的重要性,特别是其中关于奥斯曼帝国历史遗产及其对当代土耳其内政外交影响的研究,极大地扩展了相关论题的深度与广度。^⑥基于土耳其“国家身份之变”视角的研究则敏锐地注意到了地

① 参见 Ahmet Davutoğlu, “Turkey’s Foreign Policy Vision: An Assessment of 2007”, p. 78.

② Lerna K. Yanik, “Constructing Turkish ‘Exceptionalism’: Discourses of Liminality and Hybridity in Post-Cold Wa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30, No 2, 2011, pp 80-85.

③ Özgür Özdamar and Balkan Devlen, “Man vs. the System: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Arab Uprisings”, in Roberto Belloni et al., eds., *Fear and Uncertainty in Europe the Return to Re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 181-182.

④ Cengiz Dinç, “Turkey as a New Security Actor in the Middle East: Beyond the Slogans”, *Perceptions*, Vol 16, No 2, 2011, pp 62-64.

⑤ 参见 Mustafa Kutlay and Ziya Öniş, “Understanding Oscillations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Pathways to Unusual Middle Power Activism”,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2, No 12, 2021, p 3061.

⑥ 代表性研究可参见咎涛:《从奥斯曼帝国到“新奥斯曼主义”: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载北大区域国别研究委员会主编:《北大区域国别研究》(第3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78—197页;李秉忠:《转型时期奥斯曼土耳其和英帝国在中东的角力及其遗产》,《西亚非洲》,2020年第3期,第70—79页;黄民兴:《历史的轮回与帝国情结——战后土耳其外交的三次转型与“阿拉伯之春”》,《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52—56页;M. Hakan Yavuz, *Nostalgia for the Empire: The Politics of Neo-Ottoman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处欧亚十字路口的土耳其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身份危机。在土耳其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与互动中，有关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东方主义”与“西化”之间的讨论，能够为我们解释土耳其外交转变提供更加有效的理论视角。而“国家地位之变”视角下的相关研究则能为我们考察土耳其外交转变提供更加直观的实证分析。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土耳其综合国力的提升，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在各种外交场合多次声明“世界大于五”，^① 不仅反映了土耳其对联合国改革的诉求，更凸显其国家实力提升后对现行国际秩序的不满。鉴于此，基于国家角色概念的研究能够为我们理解土耳其外交政策提供一种更加简洁的方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正发党政府在土耳其对外政策中所要表达的角色意涵。^②

不过，上述研究也存在一定的缺憾与不足。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对于冷战至今土耳其外交到底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对此目前学界的判断存在明显分歧，所选取时间段的不同会造成对土耳其外交转型判断的差异；^③ 其二，现有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土耳其外交转型过程中国际、国内因素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论述，但对二者之间联系机制的探究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其三，国家身份通常是基于长期形成的历史规范和价值观，因此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内化。^④ 也就是说，国家身份具有相对稳定性，仅凭对土耳其国家身份中特征、差异等因素的分析，难以对近期土耳其外交行为的变化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除此以外，有关国家身份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其中因果关系可能并不明确；其四，基于土耳其国家实力与角色地位的相关研究忽视了国内因素的复杂性，而过分强调了国际体系层面因素和国家在构成上的“单一性”，未能注意到土耳其国内不同政治群体对土耳其实力地位和角色地位的认知差异。

在现有研究中，无论是对建构主义框架下身份因素的强调，还是结构现实主义对国家在体系中地位的关注，均着眼于宏观层面。然而，国家身份、

^①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世界不是只有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2020年9月22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9/1067282>。

^② Ekrem T. Başer, “Shift-of-axis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urkish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Before and During AKP Rule”, p. 296.

^③ 这主要体现在对土耳其外交中“安全化”因素的分析。一些学者认为土耳其外交“安全化”的出现是近年来其被动应对中东地区混乱局势的结果，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是对冷战期间土耳其外交“国家安全优先”思维的巩固与延续。参见 Gunes Murat Tezcur and Alexandru Grigorescu, “Activism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Balancing European and Regional Interes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15, No. 3, 2012, p. 263.

^④ Lucie Tungul, “Can ‘the Other’ Become ‘Us’? European Identity and Turkey”, *The Hastings Center Studies*, No. 2, January 2013, p. 21.

地位等变量受制于历史文化、国家实力等因素，短期来看变化速度缓慢，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不能有效解释短时间段（2016—2021）内土耳其外交的转折。不过，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兼顾历史与现实两种导向，能够捕捉国家行为体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细微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回应外部变化时进行政策调整的驱动性因素。^①

（三）本文的分析框架

国家对外政策分析不可能将国内与国际体系两个层面的因素完全对立。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核心议题在于建立体系和单元之间的联系桥梁，并将其统一于国家对外政策的解释中。^② 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下，体系变量内涵相对确定，主要是国际体系中力量对比等结构性因素。^③ 而国内变量则相对复杂，不同的研究会引入不同的国内变量，如国家凝聚力（精英认知）^④、国内政治势力对比^⑤、战略文化^⑥等。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以区域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和国内社会思潮演变两个因素为基础，分析土耳其近年来外交行为的变化。

就体系因素而言，体系中结构权力的变动将会对国家产生某种压力，以此推动和塑造国家行为。^⑦ 当体系结构因地缘政治格局变化或国家间权力对比失衡而产生变动时，对现状不满的国家将在体系中面临积极行动的窗口预期，这构成了国家在体系结构变化中积极行动的地缘政治机会。不过，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体系层次的核心变量主要基于地区体系结构变动而非国际体系结构变动。这是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其一，国际体系结构在较短时期内变化幅度较小，对国家外交行为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而地区体系结构有时却变化明显，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国际体系变化中的某些重要因素；其二，近年来，“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虽然朝着两极化方向发展，但国际

① 陈志瑞、刘丰主编：《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9页。

② 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构建与经验拓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115页。

③ 刘丰、陈志瑞：《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当代亚太》，2015年第4期，第15页。

④ 兰德尔·施韦勒：《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刘丰、陈永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2—64页。

⑤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er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0-25.

⑥ Collin Dueck, *Reluctant Crusaders: Power, Culture, and Chang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0-30.

⑦ Kenneth N.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1997, pp. 914-915.

体系仍然是单极结构，而非两极结构。^① 反观土耳其周边尤其是中东地区，在这一时期却面临结构权力的历史性调整，动荡、重组、失序、失衡、失控成为中东地缘政治发展的显著特征；^② 其三，2016年后，国际体系的细微变化在土耳其周边地区有着最为深刻的体现。这一时期，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③ 美西方领导力下降，世界权力重心向亚州转移，西方建立的世界秩序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④ 在中东地区，美西方战略收缩、俄罗斯强势回归、伊朗等地区大国强势崛起，使得冷战后由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出现“多极化”趋势。在高加索—中亚地区，美欧与俄罗斯战略竞争加剧，主要大国介入地区事务的力度不断加大，大国间的竞争和对抗构成了这一地区体系的突出特征。^⑤ 在北非及“非洲之角”地区，大国力量对比打破了向西方“一边倒”的趋势，朝着多元、均衡的方向不断发展。^⑥ 由此可见，土耳其周边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也集中反映了“东升西降”^⑦、“国际多边体系瓦解与重构”^⑧、“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⑨等国际体系因素变化的新趋势。此外，作为地区大国的土耳其始终把扩大地区影响力作为其谋求“全球性大国”地位的首要目标。^⑩ 因此，相较于国际体系，土耳其对地区体系的变动更加敏感。对地区体系结构变化的强调，也更能凸显土耳其外交战略选择中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机会。

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假定下，体系和地区层面因素仍需经过国内因素的传导才能最终发挥作用，因此，国家对体系或地区结构变动而产生的地缘政治机会认知还取决于国内因素的干预和介入。就国内因素而言，冷战至

① 宋伟：《世界政治视角下的国际战略格局》，《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1期，第11页。

② 唐志超：《新中东秩序构建与中国对中东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前言”，第1—2页。

③ 《习近平会见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7年12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2/28/c_1122181743.htm。

④ 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Penguin Press, 2014, pp. 212-228.

⑤ 参见王术森、曾向红：《大国中亚地区外交新态势》，《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0期，第44—52页；侯艾君：《中国在外高加索地区的安全风险及其规避》，《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2期，第84—87页。

⑥ 张宏明：《大国在非洲格局的历史演进与跨世纪重组》，《当代世界》，2020年第11期，第32—36页。

⑦ 参见高程：《全球疫情下的中西方碰撞与“东升西降”》，《文化纵横》，2020年第6期，第141页。

⑧ 参见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第15—16页。

⑨ 参见赵磊：《从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115—117页。

⑩ Mustafa Kutlay and Ziya Öniş,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 Post-western Order: Strategic Autonomy or New Forms of 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7, No. 4, 2021, p. 1103.

今，国内外学术界将心理学与生理学研究成果引入国际关系和外交决策的分析，使得国际关系的“人性化”再次成为可能。^①通过对国家行为体内部政治思潮和社会心理的探究，能够使我们深入了解有关国家在特定情境中的认知及其行为根源。罗伯特·杰维斯指出：“理解行为体的印象和认识会影响我们如何进一步研究行为体经历的事件和行为体在其他事件中的预期行为。”^②在现有土耳其研究中，哈坎·雅乌兹借鉴社会心理学中“怀旧”的概念及内涵，对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政治话语进行解析，指明了内吉梅丁·埃尔巴坎、厄扎尔及埃尔多安对“新奥斯曼主义”的不同政治愿景。^③这为我们透视土耳其国内政治变迁提供了基于社会心理学的工具。不过，雅乌兹仅是运用怀旧情绪理论进行了类型化的梳理研究，并没有详细说明土耳其国内怀旧情绪产生的过程，也没有注意到怀旧情绪对土耳其外交行为的充分影响。^④

鉴于此，在土耳其国内社会世俗主义意识形态衰弱、政治伊斯兰思潮兴起的背景下，“怀旧”视角下奥斯曼帝国历史遗产在当代土耳其社会中的继承与显现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考察土耳其国内政治演变的新切入点。本文也将在雅乌兹所做的类型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土耳其国内怀旧情绪的产生路径及其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综上所述，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范畴下，本文对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变的分析框架主要由两方面构成（如图-1所示）：其一，特定社会思潮兴起而导致的外交指导理念的变化；其二，地区体系结构变动而出现的地缘政治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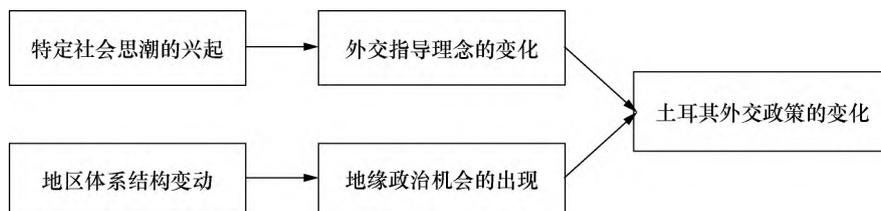


图-1 土耳其外交政策变化的根源

① 尹继武：《心理与国际关系：个体心理分析的理论与实践》，《欧洲研究》，2004年第1期，第77—78页。

②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8页。

③ M. Hakan Yavuz, *Nostalgia for the Empire: The Politics of Neo-Ottomanism*, pp. 126-178.

④ Johanna Chovanec, ed., “M. Hakan Yavuz (2020) Review: Nostalgia for Empire: The Politics of Neo-Ottomanism”, *Middle East Critique*, Vol. 30, No. 2, 2021, pp. 111-126.

二、“帝国怀旧”：土耳其外交转折的国内政治基础

总的来看，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当代土耳其最重要的历史记忆大都源自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在土耳其研究出现“帝国转向”的趋势下，对奥斯曼帝国历史及其在土耳其国内政治中的影响予以关注，有利于探究土耳其某些国家行为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深化我们对土耳其内政外交的理解。

（一）怀旧情绪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

在社会心理学中，现有研究将怀旧定义为对当下现状的否定和对过去的情感依恋。^① 怀旧通常表现为对历史和荣誉的怀念，反映了一种对过去的特殊依恋感，简言之，怀旧是“一种向往过去的情愫”。^② 弗雷德·戴维斯认为，怀旧可以被视为“在混乱的威胁中寻找连续性”的一种情绪，且“总是发生在恐惧、不满、焦虑或不确定性的背景下”。^③ 个体或集体表现出怀旧这一情绪的本质在于对历史和过去的一种“记忆”（亦即历史记忆）。^④ 中国学者赵静蓉认为，怀旧不仅仅是对过去历史的简单“记忆”，更重要的是对过去的重构和对历史的再创造。^⑤ 由此可见，个体怀旧情绪产生所依赖的两个基本条件是：独特的历史记忆和个体由现状所产生的不满情绪（包括悲伤、怨恨等）。不过，怀旧这一行为对待历史及个体经历的态度是理想化的，这将导致个体对独特历史的美化甚至是选择性记忆。

现有研究认为，怀旧情绪至少有三种作用：其一，通过对经验历史的理想化叙述或选择性记忆，维持自我身份叙事的连续性；其二，建立一种相对于其他群体的自我感知的独特性，从而构建集体认同；其三，形成一种从消

① Timur Dadabaev, *Identity and Memory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Routledge, 2016, pp. 95-96.

② 杜威·佛克马、王浩：《无望的怀旧，重写的凯旋》，《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71页。

③ Fred Davis, *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 of Nostalgia*, Free Press, 1979, pp. 30-35, quoted from Krystine Irene Batcho, “Nostalgia: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Percept Mot Skills*, Vol. 80, No. 1, 1995, p. 131.

④ 参见 H. A. Kaplan, “The Psychopathology of Nostalgia”, *Psychoanalytic Review*, Vol. 74, No. 4, 1987, pp. 465-486.

⑤ 参见赵静蓉：《怀旧文化事件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186页。

极到积极的叙述模式，从而构建更强烈的自尊体验。^①与此同时，怀旧也被认为是一种防御机制，通过这种机制，群体内部可以共享某种价值观或某一信仰。在社会环境剧烈变动时期，怀旧情绪能够提供一种稳定的情感支持，并将过去经历的感知融入群体的自传体叙述中，从而缓解现实的焦虑情绪，以维护群体自身的本体安全。^②尤其是当某一个体或群体在社会环境中被孤立时，其表现出怀旧情绪的概率将大幅上升。^③这是因为怀旧能够通过历史记忆的强调以加强与外部社会的联系感与归属感，从而维护个体或群体自尊。总之，基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怀旧是一种促进自我积极认同的有效来源，能够提升个体或群体身份的意义和自尊感。^④

关于国内社会群体的怀旧情绪对国家外交行为的影响已有部分成果予以探讨。例如在分析英国“脱欧”的原因时，有学者通过分析英国社会中主流政治思潮后认为，经历英国全球影响力下降、经济衰退等“沮丧历程”后，主张“脱欧”的政客利用民众对 20 世纪英帝国繁荣景象的怀念，以怀旧的叙事方式在社会中进行广泛动员，从而使“微弱多数”的英国人做出了支持“脱欧”的决定。^⑤一些中亚地区国家同样也强调对历史的怀旧，例如乌兹别克斯坦等国通常选择迎合国内民众对苏联时期的怀旧情绪，以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此外，鉴于苏联的历史遗产造就了这些国家当前的政治体系，因此，有观点认为，对苏联时期的怀旧同样构成了欧亚地区国家的共同遗产、身份和归属感。^⑥

通过对社会心理学中有关怀旧概念、运作机制的梳理，以及对怀旧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所发挥作用的简要概括，我们可以对国家怀旧情绪产生的原因

① 参见 A. D. Brown and M. Humphreys, “Nostalgia and the Narrativization of Identity: A Turkish Case Study”,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13, No 2, 2002, p 143; Jacob Juhl et al, “Fighting the Future with the Past: Nostalgia Buffers Existential Threat”,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Vol 44, No 3, 2010, p 310; Constantine Sedikides et al, “Nostalgia Counteracts Self-discontinuity and Restores Self-continu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45, No 1, 2015, pp 52-61.

② A. D. Brown and M. Humphreys, “Nostalgia and the Narrativization of Identity: A Turkish Case Study”, pp 143-156.

③ Xinyue Zhou et al, “Counteracting Loneliness on the Restorative Function of Nostalgia”,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19, No 10, 2008, pp 1023-1028.

④ 参见 Matthew Vess et al, “Nostalgia as a Resource for the Self”, *Self and Identity*, Vol 11, No 3, 2012, pp 273-281; Clay Routledge et al, “The Power of the Past: Nostalgia as a Meaning-Making Resource”, *Memory*, Vol 20, No 5, 2012, pp 452-460.

⑤ Edoardo Campanella and Marta Dassù, “Brexit and Nostalgia”, *Survival*, Vol 61, No 3, 2019, pp 103-105.

⑥ Timur Dadabaev, “Manipulating Post-Soviet Nostalgia: Contrasting Political Narratives and Public Recollections in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18, No 1, 2021, pp 61-81.

及影响进行如下总结（如图-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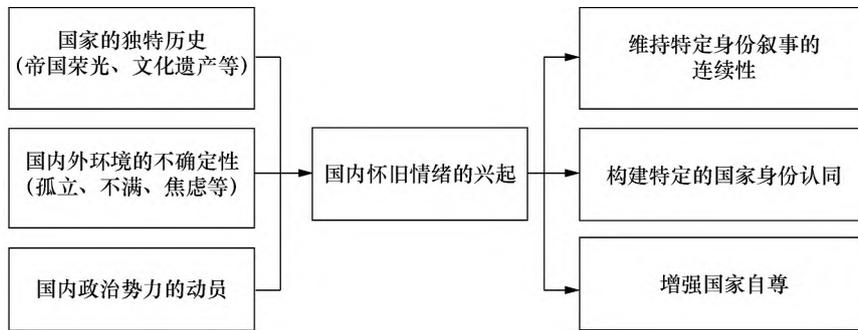


图-2 国内怀旧情绪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从怀旧情绪产生的原因来看，国家的独特历史会给国内怀旧情绪提供历史记忆的来源，特别是“后帝国”国家更容易表现出对其帝国时代影响力的怀恋。帕梅拉·巴林格和雷纳托·罗萨尔多在研究中发现，经历过强大帝国（主要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后，当前南欧地区国家社会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怀旧情绪，这种怀旧集中表现为“对传统社会逝去的悲伤”，^①或称之为“对曾经文明使命和帝国荣光的向往”。^②国内外环境的不确定性则是怀旧情绪兴起的必要条件。这种不确定性既包括国内政治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也包括国家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内外两种因素均会导致国内社会产生焦虑等消极情绪，使社会群体对现状不满。当历史回忆明显优于当下现状时，怀旧情绪就会产生。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亚国家面临财政赤字、国内经济崩溃、民众福利水平下降等困境，当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民众就曾表现出对既往苏联时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怀旧。^③

需要指出的是，有关怀旧情绪的叙事可以体现出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和政治愿景。^④因此，当作为一种集体行为时，怀旧从个体扩展到社会大众并非自然发生，而是需要政治势力在国内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这包括采用影视、文学作品等文化传播手段，使特定的怀旧情绪在民众中蔓延。

从怀旧情绪产生影响的角度看，特定政治势力对国内社会怀旧情绪的引

^① Pamela Ballinger, “Imperial Nostalgia: Mythologizing Habsburg Trieste”, *Journal of Modern Italian Studies*, Vol 8, No 1, 2003, p. 95.

^② 参见 Renato Rosaldo,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eacon Press, 1989, pp. 69-80.

^③ 参见 Stephen White, “Soviet Nostalgia and Russian Politics”,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Vol 1, No 1, 2010, p. 8.

^④ Stuart Tannock, “Nostalgia Critique”, *Cultural Studies*, Vol 9, No 3, 1995, p. 454.

导，将有助于塑造特定的身份认同，维持特定身份叙事的连续性。在剖析欧洲右翼激进政党的动员框架时，加布里埃拉·埃尔吉尼斯等人认为，利用对前帝国时代历史的怀旧，能够为政党的动员框架提供充足的民族主义要素，并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动员主框架，进而与民众间所固有的国家荣誉和政治信仰产生共鸣。^①这种怀旧通常将国家社会现状与理想化、“浪漫化”的过去历史相比较，进而强调未来的风险和挑战。这将在心理层面激发社会主体间的不安全感，从而引发社会层面的悲观情绪，为右翼民族主义政党赢得选举奠定基础。^②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特定的感受结构，怀旧可以被用于政治目的，并能够塑造政治家所希望达到的政治行为和权力目的。^③基于上述有关怀旧情绪产生的路径及其影响，后文将对土耳其近年来国内社会的政治思潮进行考察，探究其与土耳其外交行为的内在关系。

（二）土耳其国内怀旧情绪的兴起

1. 土耳其国内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复兴

奥斯曼帝国衰落后，对土耳其而言，除了遍布于环地中海地区的帝国建筑遗迹，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是奥斯曼主义和伊斯兰教。奥斯曼主义是为了在国内民族分离主义兴起和欧洲列强入侵的情况下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延续性，试图通过承认臣民共同拥有平等的权利来构造一个“奥斯曼国家”。^④由于缺乏必要的动员条件及其自身固有的“臣民关系”，^⑤奥斯曼主义最终被土耳其国内的民族主义运动和西化运动（凯末尔主义）所湮没。不过，凯末尔主义下的土耳其虽然奉行国家世俗化政策，但这仅影响伊斯坦布尔等城市地区和上层社会，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内部广袤的农村地区和中下层社会，伊斯兰教传统仍然盛行。因此，伊斯兰教的历史遗产始终植根于土耳其国内最广泛的社会环境中。^⑥尤其是在厄扎尔执政时期，经济自由化和开

^① Gabriella Elgenius and Jens Rydgren, "Frames of Nostalgia and Belonging: The Resurgence of Ethno-nationalism in Sweden", *European Societies*, Vol 21, No 4, 2019, pp 597-598.

^② Eefje Steenvoorden and Eelco Harteveld, "The Appeal of Nostalgia: The Influence of Societal Pessimism on Support for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41, No 1, 2018, pp 31-33.

^③ James Combs, *The Reagan Range: The Nostalgic Myth in American Politics*, Popular Press, 1993, p 28, quoted from Stuart Tannock, "Nostalgia Critique", p 455.

^④ Hasan Kayali, *Arabs and Young Turks: Ottomanism, Arabism, and Islamism in the Ottoman Empire, 1908-191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 18-24.

^⑤ 张向荣：《“新奥斯曼主义”：历史嬗变与影响》，《新疆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第110页。

^⑥ 严天钦、石坚：《土耳其伊斯兰复兴与现代认同》，《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271页。

放贸易政策催生了一批信奉伊斯兰传统的中产阶级，他们大都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农村地区，经由贸易经济实现阶层跃升。国内伊斯兰中产阶级的兴起，为土耳其政治领域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并促成了民族秩序党、繁荣党、正发党等一众伊斯兰政党在土耳其国内的建立。^①

在国内伊斯兰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至今土耳其“欧洲化”未果而导致的国家身份危机、凯末尔主义下世俗派与穆斯林在国内身份认同上的分裂，以及“同质化”民族政策失败而产生的库尔德民族分离等问题，使得部分土耳其人并不一定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成员。^②换言之，由于民族、宗教信仰和对东西方文化选择的差异，土耳其共和国的公民身份不能带给人们以充分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特别是凯末尔主义指导下采取的激进世俗化和民族主义政策，使得土耳其国内穆斯林和库尔德人等“政治少数群体”的平等权益未能得到充分保障。“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通人开始怀念过去。他们对奥斯曼帝国的喜爱是出于对当前不平等条件的不满和对一个所有群体都能得到尊重的共同体的渴望。”^③除此以外，中东变局后土耳其国内社会中纪念凯末尔的政治活动逐渐减少，而纪念如征服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二世诞辰等与奥斯曼帝国历史相关事件的政治活动却越来越多且变得越来越受欢迎。^④ 这些事例均说明，当前土耳其国内的身份认同危机加剧了土国内不同民族、宗教群体的分裂，凯末尔主义对民族、文化和信仰同一性的过分强调，压抑了土耳其国内社会所固有的多民族文化和伊斯兰信仰，激发了人们对曾经实行“开放包容”民族宗教政策的奥斯曼帝国的怀念。

除了政治领域，土耳其国内文学、美术和音乐等艺术领域同样出现了奥斯曼帝国遗产复兴的趋势。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其自传小说中指出，自奥斯曼帝国灭亡后，伊斯坦布尔乃至土耳其都笼罩在“呼愁”^⑤中，

^① Umut Uzer, “Conservative Narrative: Contemporary Neo-Ottomanist Approaches in Turkish Politics”, *Middle East Critique*, Vol 29, No 3, 2020, p 279.

^② M. Hakan Yavuz,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Neo-Ottomanism: Searching for a Post-National Vision”, *Die Welt des Islams*, Vol 56, No 3-4, 2016, pp 438-465.

^③ M. Hakan Yavuz, *Nostalgia for the Empire: The Politics of Neo-Ottomanism*, p 160. 这里的共同体实际上指的是奥斯曼帝国曾经施行的米勒特（Millet）制度，其内涵是在不损害帝国利益并承担相应捐税的基础上，各民族及宗教派别可以保持本民族语言文字的独立性，并可以充分享受内部自治权。这一制度的本质是一种宗教（民族）自治，是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境内宗教多元、民族包容的体现。

^④ Umut Uzer, “Conservative Narrative: Contemporary Neo-Ottomanist Approaches in Turkish Politics”, p 287.

^⑤ 《古兰经》中两次写作“huzun”，三次写作“hazen”，有忧伤之意。

这种“呼愁”源自某种帝国衰落后的忧伤，反映了一种建立在“帝国废墟上的集体记忆”。^① 20世纪80年代至今，为了缓解帝国之后的“呼愁”和凯末尔激进世俗化政策对土耳其民众精神世界的冲击，许多土耳其作家、诗人和苏菲神秘主义者都在不断挖掘被凯末尔主义所埋葬的帝国历史和伊斯兰传统，并将这些历史记忆的碎片拼凑在一起，试图纾解奥斯曼帝国历史记忆与民族国家身份之间的张力。^② 因此，为了对抗土耳其国内的主流民族主义叙事，这一时期的土耳其文学艺术作品大多凸显奥斯曼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特点，内容多为歌颂奥斯曼帝国时期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③

综上所述，土耳其共和国建立至今，凯末尔主义的激进世俗化政策与土耳其国内原有伊斯兰传统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催生了土国内伊斯兰保守群体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推崇和对复兴伊斯兰文化传统的渴望。对此，雅乌兹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为土耳其提供了一个能够有效塑造国家身份认同的宝库。^④ 随着土耳其社会的繁荣和伊斯兰中产阶级的兴起，以奥斯曼主义和伊斯兰传统为代表的奥斯曼帝国遗产已经在土耳其政治、社会等领域复兴。

2. 土耳其国内及地区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

2002年正发党上台执政以来，得益于世界经济处于高增长周期的发展红利，土耳其经济凭借吸引外国投资和扩大对外出口实现了高速增长，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全球新兴经济体转型的“典范”。然而2007年后，随着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步伐放慢，同时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土耳其经济连连滑坡。2011年中东变局后，面对中东地区局势动荡，土耳其经济增长陷入持续疲软。这一时期，土耳其国内经济增长率连续下降，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高企，居民收入大幅缩水。经济发展停滞使土耳其社会中的不满情绪持续蔓延，甚至导致2013年在伊斯坦布尔盖齐公园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

2016年“7·15”未遂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在国内的肃清行动引起欧洲国家及美国的不满。特别是“布伦森牧师案”使得美国特朗普政府威胁对土施加严厉制裁，世界主要经济体因此降低了对土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期，土耳其国内随即出现“里拉危机”。受到土美、土欧关系恶化，以及时任美国

^① 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5—102页。

^② Nora Fisher Onar, “Echoes of a Universalism Lost: Riv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ttomans in Today’s Turke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5, No 2, 2009, pp 229-241.

^③ 张虎：《21世纪的土耳其小说：现状与隐忧》，《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7年第2期，第19—23页。

^④ 参见 M. Hakan Yavuz,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Neo-Ottomanism: Searching for a Post-National Vision”, p 440.

总统特朗普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中东难民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土耳其经济增长率在 2019 年跌至 0.9%，而同期国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则分别高达 15.2% 和 13.7%。^① 总的来看，中东变局后的土耳其面临国内外经济环境恶化的艰难处境，正发党和总统埃尔多安宣称要建立“新土耳其”的政治主张也在土国内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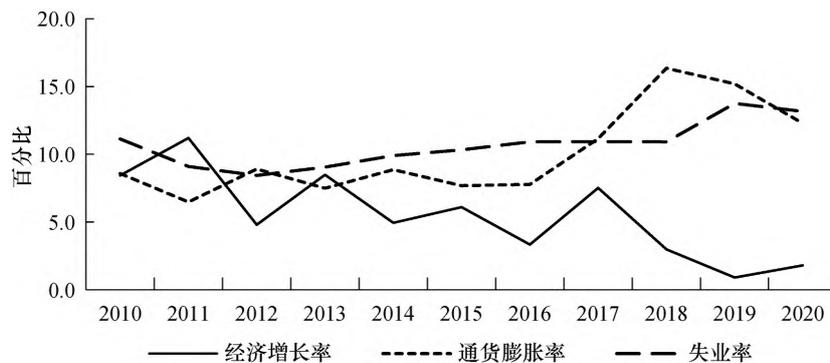


图-3 2010—2020 年土耳其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

资料来源：The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 Database,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1/October>.

除了国内日益凸显的经济困境，土耳其还面临库尔德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这更加剧了正发党政府在国家安全和地区环境中的“不安全感”。中东变局以来，库尔德工人党受到美国资助，势力逐渐扩大，并重提建立“库尔德国家”的政治愿景。对此，土耳其对库尔德工人党及其分支始终采取高压态势，埃尔多安更明确表示：“土耳其不会容忍在美国的支持下于其边界附近建立叙利亚库尔德人恐怖主义国家。”^③ 执政至今，埃尔多安主张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新思维”，^④ 实际上推翻了凯末尔所宣称的土耳其国家构成的“单一民族”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否定了凯末尔主义。然而，埃尔多安的“新思维”不仅没有实现国内的民族和解，反而使得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地带的库尔德人出现合流趋势，“叙利亚民主军”的力量进一步壮大，最终导

① The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 Database,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1/October>

② 邹志强：《土耳其经济治理的危机与转型》，《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4 页。

③ 《埃尔多安：土耳其不会允许美国在叙建立库尔德人恐怖主义国家》，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安卡拉 2017 年 12 月 5 日电。

④ “新思维”的内涵可参见曾涛：《奥斯曼帝国晚期与现代土耳其官方关于“库尔德问题”话语的嬗变》，《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 年第 6 期，第 18—20 页。

致土耳其国内外安全形势恶化。

在国际层面，中东变局后土耳其对国际和地区形势严重误判，一改先前所奉行的实用主义“零问题”外交政策，转而向中东地区输出“土耳其模式”，扶植逊尼派穆斯林势力。土耳其不仅公开反对叙利亚巴沙尔政府，还借此批评俄罗斯和伊朗的对叙政策，更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表示同情和支持，土俄、土伊、土以关系同时恶化。这一时期盲目冒进的地区政策致使土耳其入盟谈判进程受阻，在地区层面遭遇孤立，最终被迫改行被称为“宝贵孤独”的外交政策。^①。2016 年未遂军事政变后，土耳其国内政治体制由议会制向总统制过渡，这更使美欧等西方世界认为土耳其出现所谓“民主的倒退”，土耳其“欧洲化”与“西方化”进程陷入停滞。在与地区国家及西方盟友关系变坏的情况下，土耳其在国际社会中被孤立的态势越发明显，并逐渐演变为对地区秩序和现行国际秩序的强烈不满。

综上所述，2011 年以来，土耳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国内外危机因素的叠加使得土耳其同时面临国家社会发展、国内政治变动和国际局势剧变三个方面的巨大不确定性。在国家和社会发展出现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土耳其的现实困境和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荣光形成剧烈反差，从而直接激起了朝野对恢复“帝国荣光”的憧憬和渴望。

3. 土耳其国内政治势力对怀旧情绪的动员

在国内社会出现帝国遗产复兴的情况下，土耳其国内政治保守派（主要是中右翼伊斯兰势力）选择利用这一趋势，以冲破凯末尔主义对土耳其国家发展所设下的“桎梏”。

20 世纪 90 年代初，适逢冷战结束和南斯拉夫解体，为了适应巴尔干半岛新国家的出现、填补冷战结束造成的意识形态真空，厄扎尔在其总统任内利用国家媒体、音乐艺术、学校教育等手段大力宣扬“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巴尔干和土耳其是极其美好的”，试图使奥斯曼帝国历史成为巴尔干新独立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借此凸显“土耳其共和国是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继承人”。^② 这虽然旨在确立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和地位，但无疑助推了奥斯曼主义在土耳其国内的复兴。

埃尔巴坎在此期间则极力推动以复兴伊斯兰主义为目标的“民族观念运动”（Mill Görü Hareketi），并试图恢复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社会中的主导地位。

^① 李秉忠：《土耳其“宝贵孤独”外交及其走向》，《现代国际关系》，2014 年第 3 期，第 10—16 页。

^② Yılmaz Çolak, “Ottomanism vs. Kemalism: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Pluralism in 1990s Turke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2, No 4, 2006, p. 592.

“民族观念运动”的兴起造就了诸如繁荣党、美德党、幸福党等具有鲜明伊斯兰倾向的政党，加之这一时期土耳其入盟进程陷入困境，国内反西化浪潮涌动，因而这些政党所宣扬的伊斯兰价值观得到更多土耳其人的认同。^①特别是埃尔巴坎极力宣扬“建立一个平行的、伊斯兰的国际体系”，^②这一目标更迎合了土国内关于“西方道德败坏、伊斯兰文明优越”的民族主义情感。

2002年，埃尔多安所领导的正发党上台执政。迫于对土耳其军方严格限制国内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忌惮，埃尔多安起初并未对国内伊斯兰主义的兴起表现出支持的态度，相反致力于改善国内的教俗关系、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正发党这一包容的政治立场被认为是土耳其右派政治传统的延续，同时也为把“奥斯曼帝国”带回土耳其国家政治话语奠定了基础。^③由于土耳其国内始终将伊斯兰教看作是奥斯曼帝国历史的应有之义，^④因此当正发党政府表现出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推崇时，实际上也是为了迎合国内保守派政治势力。2003—2012年间，时任总理埃尔多安在官方演讲和日常文件中经常会选择奥斯曼土耳其语中的象征性词汇，意欲借此“唤起奥斯曼帝国的过去”。^⑤在2009年的一次公众演讲中，埃尔多安甚至当众发出“我们是奥斯曼帝国子孙！”的感叹。^⑥在国内教育领域，正发党政府将奥斯曼土耳其语作为高中课程的选修课，以期实现奥斯曼语言文化在土耳其国内的复兴。^⑦

中东变局后，面对土耳其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不确定性，正发党政府开始尝试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与其内政外交政策之间建立关联。例如，2013年在对伊斯坦布尔马尔马雷地铁项目的新闻报道中，埃尔多安宣称这条连接伊斯坦布尔欧洲部分与亚洲部分的地铁项目受到了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

① 郭长刚：《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与伊斯兰政党的发展》，《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5期，第4—14页。

② 参见 Galip Dalay,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fter Davutoglu: Continuity vs. Rupture”, Al Jazeera Centre for Studies, July 14, 2016, p. 5, <https://studies.aljazeera.net/en/reports/2016/07/turkish-foreign-policy-davutoglu-continuity-rupture-160714100039252.html>.

③ Hakan Ovunc Ongur, “Identifying Ottomanisms: The Discursive Evolution of Ottoman Pasts in the Turkish Present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51, No. 3, 2014, p. 424.

④ Behlül Özkan, “Turkey’s Islamists: From Power Sharing to Political Incumbency”, *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Vol. 14, No. 1, 2015, p. 73.

⑤ Hakan Ovunc Ongur, “Identifying Ottomanisms: The Discursive Evolution of Ottoman Pasts in the Turkish Presents”, p. 426.

⑥ 参见 Edward Wastnidge, “Imperial Grandeur and Selective Memory: Re-assessing Neo-Ottomanism in Turkish Foreign and Domestic Politics”, *Middle East Critique*, Vol. 28, No. 1, 2019, p. 13.

⑦ “Bu ders artık zorunlu!”, April 7, 2013, <https://www.gazetevatan.com/gundem/bu-ders-artik-zorunlu-527935>.

勒·迈吉德二世的启发。^① 时任总理首席顾问达武特奥卢在谋划土耳其外交战略时，也从奥斯曼帝国历史和地理的“战略纵深”出发，佐证其外交政策的合理性。2016 年未遂军事政变后，土耳其国内世俗派势力衰微，正发党政府愈发表现出对复兴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强烈愿望。2017 年 12 月，埃尔多安在访问喀土穆时宣布，苏丹将授予土耳其 99 年的租约，以修复位于红海海岸附近的苏阿金岛奥斯曼帝国遗迹。埃尔多安还宣称：“（土耳其人将）恢复这些历史遗迹，并使其配得上奥斯曼帝国历史的荣耀。”^② 2020 年 7 月 10 日，埃尔多安正式宣布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博物馆将以清真寺的形式向穆斯林开放，这一举动立即招致基督教国家的强烈反对，被视为“变化了的土耳其现实政治对历史记忆的操控”，其目的也是为了迎合土耳其国内的保守派势力。^③

由此可见，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土耳其国内上台执政的保守派政党及领导人大多对奥斯曼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回潮采取纵容和迎合的态度。其间虽有军方介入予以遏制，但正发党上台后军方在土耳其国内的民主化改革中被排挤出政治舞台，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势力逐渐衰微。此后，国内保守派政治势力对复兴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动员意愿更加强烈，其动员能力也更加强大。以伊斯兰教和奥斯曼主义为主要代表的奥斯曼帝国遗产在土耳其国内影响力剧增。

（三）“帝国怀旧”情绪的形成及其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影响

自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以国父凯末尔为代表的世俗派势力极力推动土耳其国家世俗化、“西方化”，以期实现现代化。然而，由于土耳其国家既拥有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记忆，又存在伊斯兰的宗教身份，因此土耳其始终面临实现现代化和自身民族国家身份建构之间的张力。^④ 在凯末尔主义激进世俗化政策和民族政策的统治下，这种张力逐渐增大，日渐成为割裂土耳其国内宗教群体与世俗群体、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主要原因。为了缓解这种张力带来的国家身份焦虑，土耳其国内政治领域和文化艺术领域逐渐出现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复兴，其内容及表现形式凸显伊斯兰主义和奥斯曼主义的特

^① “Bakınız Marmaray’ın Gerçek Sahibi Kimmiş”, *Sarıyer Times*, October 30, 2013, <https://www.sariyertimes.com/siyaset/bakiniz-marmarayin-gercek-sahibi-kimmis/>.

^② Asya Akca, “Neo-Ottomanism: Turkey’s Foreign Policy Approach to Africa”, p. 4, <https://dehai.org/dehai/public/assets/dehai/2021/321231-Neo-Ottomanism-Turkey%E2%80%99s%20foreign%20policy%20approach%20to%20Africa.pdf>

^③ 曾涛：《被操纵的历史记忆：世界遗产圣索菲亚博物馆改为清真寺》，《新京报》，2020 年 7 月 17 日，<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59495684615113.html>。

^④ 参见曾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第 5—10 页。

点。经过保守派政治势力的引导动员，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在土耳其国内受众范围更广，接受程度也更高。2011年中东变局后，土耳其内政外交深陷困境，无论是国内经济发展停滞，还是国际交往陷入所谓“光荣孤立”，均不同程度地加深了正发党政府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土耳其的内政外交也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这一时期，土耳其民众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兴趣明显提高，不仅以各种纪念活动表达对奥斯曼帝国苏丹、帕夏及重要历史事件的怀念，更表现出对当前土耳其恢复所谓“奥斯曼帝国荣光”的强烈愿望。这其实是一种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怀旧，亦可称之为“帝国怀旧”。“帝国怀旧”情绪的兴起深刻影响着土耳其国内社会风尚及内政外交政策。例如，在社会层面，土耳其餐馆重新设计具有奥斯曼帝国特色的菜单，以迎合人们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浓厚兴趣。^①在国内政策方面，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正在经历一个显著的“伊斯兰化”进程，2002年至今，土耳其地方政府已在城市中重建约2万座清真寺，并试图将清真寺打造为城市的“新天际线”。^②在外交政策方面，“帝国怀旧”影响下的土耳其外交倾向发生明显变化，正发党政府对国家利益边界的限定不再完全取决于与欧洲国家的关系，而是延伸到具有共同文化的邻国，并由奥斯曼帝国历史遗产和政治承诺所决定。^③总之，土耳其国内奥斯曼帝国遗产复兴、保守派政治势力引导，以及内政外交中不确定性的出现，共同导致土耳其国内出现了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怀旧情绪，即“帝国怀旧”。这种“帝国怀旧”既存在于土耳其国内的普通民众中，又存在于埃尔多安及正发党的领导层中，其主要诉求在于将奥斯曼帝国历史作为政党（主要是正发党）执政、政策实施及国家行动的合法化工具，并试图将土耳其塑造成为历史记忆中的国际和地区“领导者”角色。^④

国内“帝国怀旧”情绪的出现给土耳其内政外交政策带来显著影响，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土耳其国家身份中的“欧洲”因素不断减弱，而“奥斯曼帝国继承者”因素凸显强化，土耳其外交重心也逐渐转向原奥斯曼帝国领域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第二，加速凯末尔主义思想的边缘化趋势，助推土耳其国内伊斯兰民粹主义思潮，进一步强化民众对当前土耳其

① M. Hakan Yavuz, *Nostalgia for the Empire: The Politics of Neo-Ottomanism*, pp. 170-171.

② *Ibid.*, p. 169.

③ “The Erdogan Doctrine: Turkey’s Regional Strategy”, Al Jazeera Centre for Studies, October 15, 2020, <https://studies.aljazeera.net/en/policy-briefs/erdogan-doctrine-turkey%E2%80%99s-regional-strategy#main-content>

④ Edward Wastnidge, “Imperial Grandeur and Selective Memory: Re-assessing Neo-Ottomanism in Turkish Foreign and Domestic Politics”, pp. 13-15.

外交政策中伊斯兰、突厥等非西方因素的认同；^① 第三，在土耳其遭遇国际社会孤立时，“帝国怀旧”能够增强土耳其的国家自尊，维持既定外交政策的合法性。

三、周边政治格局变化：土耳其外交面临的地缘政治机会

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中出现自西向东的权力转移，权力重心逐渐向新兴国家倾斜，大国关系竞合态势凸显。^② 一方面，土耳其既是一支重要的新兴国家力量，又位于东西方交界处的中东地区，对周边安全环境变化高度敏感；^③ 另一方面，中东、北非乃至高加索地区都曾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疆域，也是当前土耳其在“帝国怀旧”情绪驱使下致力于扩展其影响力的区域。因此，土耳其在上述地区的外交政策目标主要在于复兴历史性大国地位，整合历史上的旧疆界和所谓“突厥民族共同体”，^④ 争夺地区领导权。^⑤ 2011 年后，中东地区面临地区局势和权力对比的重大变化，冲突对抗、零和博弈构成地区大国关系的核心特征，土耳其也成为地区权力中心的一极。^⑥ 在中东大变局的背景下，土耳其周边地区（主要是原奥斯曼帝国疆域）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将会为“帝国怀旧”情绪笼罩下土耳其实现谋求“帝国荣光”、追求“全球性大国”地位的目标提供政治机会。

（一）2016 年前后土耳其周边地缘政治格局变化

1. 美俄欧在土耳其周边地区的权力博弈出现相对均衡的新态势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美国推

^① Ezgi Elçi, “Politics of Nostalgia and Populism: Evidence from Turke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January 27, 2021, pp. 12-14, DOI: <https://doi.org/10.1017/S0007123420000666>.

^② 吴志成、董柞壮：《国际体系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第 125 页。

^③ 有学者将其称为“色佛尔恐惧症”，表现为对国家安全的高度关注，源自《色佛尔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瓜分土耳其领土的历史记忆。参见 Dietrich Jung, “The Sevres Syndrome: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Its Historical Legacy”, in Bjorn Muller, ed., *Oil and Water: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the Persian Gulf*, I. B. Tauris, 2001, pp. 131-159.

^④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突厥汗国的灭亡，突厥作为一个民族早已消失在世界历史中，因此，当前土耳其所鼓吹的所谓“突厥民族”仅是其“帝国外衣”下谋求政治扩张的工具。参见张玉艳：《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由来与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19 年第 5 期，第 51—66 页。

^⑤ 康杰：《霸权之后的“新中间地带”》，《文化纵横》，2022 年第 1 期，第 32—37 页。

^⑥ 刘中民：《缓和与发展的中东地区形势》，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 年 1 月 27 日，http://www.cssn.cn/gjgxx/gj_bwsf/202201/t20220127_5390743.shtml。

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在中东、非洲等地区相继碰壁。^①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谋求实现战略收缩。在中东地区，美国战略收缩态势更为明显，这主要体现在奥巴马政府后期对中东地区事务的介入意愿不断降低。2011年后，由美国所支持的所谓“民主化”浪潮导致地区内多国政权更迭，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变局之下，中东地区格局逐渐呈现从单极走向多极、从静态均势转向动态均势、权力结构多元化三个特点。^②美国的战略收缩为俄罗斯、伊朗等国彰显其地区影响力提供了机遇。在中东大国博弈最核心的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虽然力推阿斯塔纳进程作为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首要途径，但单凭俄罗斯一国无力承担叙利亚维和与战后重建的巨额开支。这也表明，俄罗斯对中东地区事务介入的意愿强烈、能力有限，尚无法取代以往美国及其盟友在中东的地位。^③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在中东地区继续支持以色列、沙特等传统盟友，甚至通过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方式怂恿以色列介入叙利亚内战，以此彰显美国回调中东政策的决心。^④在“俄进美退”、“俄弱美仍强”的大国权力变化下，美国在中东维持战略存在意愿的减退为新国家加入中东权力角逐创造了可能。^⑤

在东地中海地区，能源竞争成为美俄欧三方权力博弈的主要抓手。欧盟为了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依靠塞浦路斯和希腊在东地中海地区展开对海洋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争夺，甚至一度谋划实施东地中海管道项目。美国则依靠以色列参与东地中海油气资源争夺，试图阻挠地中海区域资源开发，提高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量，以此增强对欧能源供应的控制能力。^⑥俄罗斯选择以对欧能源出口为筹码，在叙利亚问题和乌克兰问题上向欧洲国家持续施压。围绕能源问题，美俄欧三方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权力争夺各有其代理人，但由于希腊等国实力有限、欧洲能源受制于俄罗斯、美国从中搅局等因

① 赵磊：《从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115—119页。

② 参见孙德刚：《土耳其政局与未来中东地区格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8月11日，第3版。

③ 吴冰冰：《中东地区的大国博弈、地缘战略竞争与战略格局》，《外交评论》，2018年第5期，第54页。

④ 参见刁大明：《迁馆耶路撒冷：国内政治与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议程设置》，《外交评论》，2018年第4期，第138—140页。

⑤ 参见 Bertrand Badie, “New Regional Powers Confronting Uncertainties in the Middle East”, in Bayram Balci and Nicolas Monceau, eds., *Turkey, Russia and Iran in the Middle East: Establishing a New Regional Order*,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pp. 148-150; 余建华：《中东局势演进刍议》，《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6期，第45页。

⑥ Andreas Stergiou, “Geopolitics and Energy Security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The Formation of New ‘Energy Alliances’”, in Zenonas Tziarras, ed., *The New Geopolitics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Trilateral Partnerships and Regional Security*,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2019, pp. 24-26.

素，东地中海地区针对能源竞争的权力博弈基本处于胶着态势。

在高加索—中亚地区，美欧走向合作，并与俄罗斯展开战略竞争。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围绕北约扩员问题，美欧与俄在高加索地区展开激烈争夺，并将格鲁吉亚加入北约议题作为对冲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战略影响力的重要抓手。其二，美国在地区战略中有意将阿塞拜疆作为美军后勤补给基地，而欧盟则积极通过经济援助等手段试图将高加索诸国融入“欧洲文明圈”，这更加剧了俄罗斯与美欧的战略竞争。与此同时，欧洲国家积极介入高加索地区领土争端问题的解决进程，如欧盟向南高加索地区派驻特别代表，以加强冲突调解能力，这也使得高加索地区呈现出民族问题、领土争端、大国博弈三者相互交织的态势。其三，在中亚地区，美国始终将遏制俄罗斯、整合中亚国家民主价值观、塑造地区地缘政治环境作为其中亚战略的三重目标，^① 欧盟则与美相互协作，共同致力于在中亚地区推广民主制度，对抗俄罗斯的战略影响力。然而，在高加索—中亚地区的大国博弈中，美俄欧任何一方都难以占据主导地位。^② 其原因在于上述区域均属于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颜色革命”、北约东扩、欧盟“民主化中亚战略”等西方因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俄罗斯既有战略影响力实现了对冲，但美欧同时也面临战略投入有限、比较优势不明显，^③ 以及地区规范绩效不佳、规范共鸣不强等^④因素限制。

综上所述，对比 2016 年前后两个时期，土耳其周边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显著特征是美俄欧三方权力博弈出现相对均衡的态势。随着美国战略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美国在土耳其周边地区的战略接触逐渐减弱，周边地区权力平衡的巨大变化为土耳其实现其外交目标提供了一个更加宽松的战略环境。^⑤

2. 中东地区国家关系由教派分化走向争夺地区主导权的竞争

中东地区位于土耳其的南向腹地，在土耳其外交偏离“欧洲化”、回归“中东化”的背景下，中东地区内部国家权力对比的变化也成为土耳其关注的重点。

① 曾向红：《遏制、整合与塑造：美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俄罗斯研究》，2013 年第 5 期，第 120—160 页。

② 孙超：《南高加索安全复合体的生成困境探析》，《俄罗斯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135 页。

③ 曾向红：《美国新中亚战略评析》，《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33 页。

④ 参见曾向红：《“规范性力量”遭遇“新大博弈”：欧盟在中亚推进民主的三重困境》，《欧洲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45—58 页。

⑤ Federico Donelli, “Explaining the Role of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Turkey’s Foreign Policy Behaviour”, *Interdisciplinary Political Studies*, Vol 6, No 2, 2020, p. 235.

2011年中东变局后，中东地区国家分化重组的特征愈加明显，以宗教派别为区分的国家集团对抗被一些学者称为阿拉伯世界的“新冷战”。^①一方面，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为代表的逊尼派伊斯兰力量迅速壮大，其所宣扬的温和伊斯兰民主也得到美国奥巴马政府及欧洲国家的支持，逐渐成为中东变局的“领头羊”。另一方面，以伊拉克、叙利亚、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伊斯兰势力或受到中东变局冲击，或受到美国制裁，其实力不断削弱，无力与逊尼派国家相抗衡。然而，2013年埃及发生军事政变，时任总统穆尔西及穆兄会势力被逐出埃及政坛，中东地区逊尼派伊斯兰运动此后也逐渐衰落。与此同时，伊朗凭借俄罗斯的支持在什叶派伊斯兰国家中掀起反美浪潮，其与沙特等逊尼派国家展开的宗派竞争日渐激烈。总的来看，2011年后中东地区持续上演世界大国、地区大国和中小国家及国内派系之间的三层复杂博弈，^②逊尼派与什叶派伊斯兰势力的分化斗争趋于白热化，并在2016年沙特与伊朗断交事件中达到顶峰。

2016年后，随着美国势力淡出中东，土耳其、沙特和卡塔尔等逊尼派国家开始跃跃欲试，企图担当地区领导者角色。^③然而，由于逊尼派伊斯兰势力内部各方实力基本相当，无法自然形成公认的宗派“领袖”，逊尼派国家间权力竞争趋于激化。因此，在什叶派国家受到中东变局侵袭逐渐衰弱的背景下，沙特、卡塔尔等逊尼派国家对地区领导权的激烈争夺成为这一阶段中东地区局势的主要特征。2017年沙特等国与卡塔尔爆发断交危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卡塔尔积极扶植穆兄会、哈马斯等势力，这与以沙特为代表的传统逊尼派伊斯兰势力相左。^④

由此可见，2011年至2015年间，中东地区国家间主要呈现出逊尼派与什叶派势力分化对抗的特征。2016年后，美国的战略收缩打乱了地区原有权力格局，加剧了逊尼派伊斯兰势力内部对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在美俄欧等大国力量相对均衡的背景下，中东地区国家间的权力竞争发生外溢，并体现为沙特等国对“非洲之角”地区的争夺。^⑤

^① Bulent Aras and Emirhan Yorulmazlar, “Mideast Geopolitics: The Struggle for a New Order”,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4, No 2, 2017, p. 58.

^② 参见邹志强：《土耳其的中东地缘三角战略：内涵、动力及影响》，《国际论坛》，2018年第6期，第16页。

^③ 唐志超：《新中东秩序构建与中国对中东战略》，第55—56页。

^④ 孙德刚、安然：《“同质化联盟”与沙特—卡塔尔交恶的结构性根源》，《西亚非洲》，2018年第1期，第79页。

^⑤ Michael B. Bishku, “The Muslim Middle East and Northeast Africa: The Interaction of Geopolitics, Economic Interests, and Regional Rivalry”, *Journal of Global South Studies*, Vol 36, No 1, 2019, p. 15.

（二）土耳其对周边地区地缘政治机会的认知

对于 2011 年发生的中东变局，土耳其正发党领导人普遍认为“‘阿拉伯之春’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政治机会，这使得土耳其能够扮演地区（逊尼派伊斯兰势力）领导者的角色”。^①一方面，中东变局使中东国家依据宗教派别而产生的分化重组日渐明晰，逊尼派伊斯兰势力借助美西方掀起的地区“民主化”浪潮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土耳其作为逊尼派伊斯兰势力中实力相对较强的一方，试图利用中东变局推广“土耳其模式”和“温和伊斯兰民主”的政治价值观，以帮助中东国家实现“民主化”，借此将土耳其塑造为地区“领导者”。时任土耳其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甚至认为“‘阿拉伯之春’有利于结束冷战残留在中东地区的旧秩序，并与当今主流世界观产生共鸣”。^②

2016 年后，美国全球霸权呈现战略收缩态势，在中东地区战略存在的意愿不断减退，中东地区体系逐渐向非西方主导的多极体系转变，这为土耳其、沙特、伊朗这类地区中等强国提供了积极出击的战略机会。^③这一时期，叙利亚内战、也门内战、“伊斯兰国”等问题造成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美俄欧三方权力博弈所出现的均衡态势也意味着“美国独大”的中东权力格局被打破。在域外大国权力相对均衡、地区国家争夺主导权、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的背景下，域内国家无法就地区安全问题达成一致，更难以形成集体安全协调机制。对此，埃尔多安认为，“土耳其拥有关键的战略位置，以及作为‘奥斯曼帝国继承者’的历史身份；当中东局势陷入困境时，土耳其应该成为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角色。”^④此话实际上表明了土耳其插足中东、试图领导地区事务的决心。实际上，自 2016 年以来，土耳其始终坚持推行极具进攻性的地区安全政策，即使面临与北约盟友关系破裂的风险，正发党政府仍然频繁利用军事力量越界打击叙境内库尔德武装，以此加强应对内外威胁的军事能力。^⑤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中东、东地中海、高加索—中亚这三个土耳其毗邻区域的权力博弈中，美俄欧大国实力的均等态势和地区

^① 参见 Menderes Çınar, “Turkey’s ‘Western’ or ‘Muslim’ Identity and the AKP’s Civilizational Discourse”, *Turkish Studies*, Vol 19, No 2, 2018, p. 187.

^② 参见 Bülent Aras, “Davutoğlu Era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Revisited”,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16, No 4, 2014, p. 408.

^③ Greg Simons, “Geopolitical Regionalisms Resulting From US-Led GWOT, Colour Revolutions and Arab Spring: Implications for Turkish Defence and Foreign Policy”, *Marmara Univers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Cilt 9, Sayı 2, 2021, p. 280, DOI: 10.14782/marmarasbd.996928.

^④ 转引自 Aurel Lazăr, “Weakening Transatlantic Links? Re-assessing Turkey-NATO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L’Europe Unie*, No 17, 2021, p. 75.

^⑤ Eren Alper Yılmaz,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 Neorealist Framework: Bilateral Relations since 2016”, *Middle East Policy*, November 20, 2021, p. 158, DOI: <https://doi.org/10.1111/mepa.12577>.

安全环境的恶化为土耳其这样的区域次强国家提供了消极的窗口预期。^① 因而，土耳其愿意打破现状，选择承担激进行动的战略风险，借此塑造对其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综上所述，2011年中东变局为土耳其提供了放弃“零问题”外交政策的地缘政治机会，此后，土耳其开始积极介入周边地区事务。2016年后，随着周边地区大国权力博弈出现相对均衡的态势，中东地区国家关系也由教派分化走向争夺地区主导权的竞争，进而不断强化土耳其对地区体系改变而出现地缘政治机会的认知：其一，坚定支持地区盟友卡塔尔，与沙特、伊朗展开地区领导权的竞争；其二，在外交上摆脱西方国家的制约，自主性不断增强。在其强烈的机会认知影响下，针对中东、东地中海、高加索等地区出现的动荡局势，土耳其开始基于“伊斯兰责任”和“奥斯曼帝国继承者”等“帝国怀旧”情势展开大范围、高强度的外交介入，甚至不惜以恶化与美欧等盟友的关系为代价，动用军事手段，彰显其争当地区领导者的大国抱负。

四、“四面出击”：土耳其外交转折的形成

2014年后土耳其外交虽然陷入孤立处境，并由此引发土国内经济滑坡和难民危机，但是，正发党政府及埃尔多安本人的支持率却不降反升，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借助“帝国怀旧”情绪，埃尔多安及正发党在国家面临危机时执政的正当性增强。^② 一方面，土耳其民众对国家发展现状的不满激起了对奥斯曼帝国辉煌历史的怀念，迫切希望政府能够扭转经济颓势、提高国际声望，重回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另一方面，在“帝国怀旧”情绪不断高涨的情况下，恢复奥斯曼时期的“帝国荣光”几乎成为土耳其普通民众、执政的正发党及国家领导人的一致愿望。其实，这种愿望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记忆和对帝国历史上最高领导者的崇拜高度相关。已有研究表明，土耳其国内伊斯兰主义者对奥斯曼帝国的两位苏丹尤其怀念：一位是征服君士坦丁堡并终结拜占庭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他代表了国家的强盛和伊斯兰教的正统

^① 关于消极的窗口预期与崛起国行为的讨论，可参见秦立志：《窗口预期与崛起国应对战略透支风险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1期，第110—113页。

^② 土耳其国内在此时期尤其盛行美化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的历史，这被看作是埃尔多安为强化其总统权力、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和对抗西方国家所展开的舆论攻势。参见 Soner Cagaptay, *The New Sultan: Erdogan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 Turkey*, I. B. Tauris, 2017, pp. 197-199.

地位；另一位则是奥斯曼帝国晚期抵抗西方列强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他象征着帝国面临威胁时“救亡图存”的精神。^①2012年，在正发党的资助和支持下，记录穆罕默德二世时期历史的电影《征服1453》在土耳其公映，并创下年度最高票房。^②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借助历史宣传和舆论工具，埃尔多安及正发党引导国内民众与保守派政治精英产生了基于“帝国怀旧”的情感共鸣。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怀旧为正发党政府所推行的“积极进取”和谋求大国地位的“冒险主义”外交政策提供了特定的国内政治基础。

2011年中东变局后，时任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宣称：“作为奥斯曼帝国历史的‘继承者’，土耳其将密切关注曾经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土地。”^③在“奥斯曼帝国继承者”的语境下，美欧西方世界被呈现为更显著的“他者”，而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所构建的“新土耳其”有一个“比基督教社会更道德和更先进的‘文明社会’”。^④达武特奥卢此番表态说明，在正发党治下，土耳其国家身份中所谓“突厥民族”、政治伊斯兰主义和奥斯曼主义的特征更加突出，而土耳其外交重心也逐渐向突厥语世界、中东地区，以及原奥斯曼帝国领域内的国家和地区倾斜。由此可见，在“帝国怀旧”情绪基础上所形成的“帝国继承者”身份为土耳其在原奥斯曼帝国区域谋求影响力的外交行为提供了“合理依据”。此后，“零问题”外交的基本原则被打破，“战略纵深主义”成为土耳其外交的新指导方针。在“战略纵深主义”影响下，土耳其开始在中东及周边地区主动出击，不断加强在原奥斯曼帝国区域内的战略存在，以此彰显“土耳其模式”的优越性及其地区领导者地位。土耳其这一时期的外交新动向也被一些学者称为“新奥斯曼主义”。^⑤

① 参见 M. Hakan Yavuz,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Neo-Ottomanism: Searching for a Post-National Vision”, pp. 457-459.

② 对土耳其历史剧与其国内怀旧情绪的相关研究，参见 Senem B. Çevik,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Propagating AKP’s Ottoman Empire Narrative on Turkish Television”, *Middle East Critique*, Vol. 29, No. 2, 2020, pp. 180-197.

③ 参见 M. Hakan Yavuz, *Nostalgia for the Empire: The Politics of Neo-Ottomanism*, pp. 186-187.

④ Senem Aydın-Düzgit, “Foreign Policy and Identity Change: Analysing Perceptions of Europe among the Turkish Public”, *Politics*, Vol. 38, No. 1, 2018, pp. 29-31.

⑤ 关于“新奥斯曼主义”及其对土耳其内政外交影响的研究不胜枚举，可参见张向荣：《“新奥斯曼主义”：历史嬗变与影响》，第108—118页；Umut Uzer, “Conservative Narrative: Contemporary Neo-Ottomanist Approaches in Turkish Politics”, pp. 275-290；Clemens Hoffmann, “Neo-Ottomanism, Eurasianism or Securing the Region? A Longer View on Turkey’s Interventionism”,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Vol. 19, No. 3, 2019, pp. 301-307。需要说明的是，土耳其官方在阐述其外交政策时从未使用过“新奥斯曼主义”一词，只是强调将会更加关注与原奥斯曼帝国领域范围内国家的关系。“新奥斯曼主义”这一概念是西方学者强加给土耳其的政策描述，达武特奥卢以及埃尔多安都极力否认这一提法。参见“Davutoglu: ‘I’m Not a Neo-Ottoman’”, *Balkan Insight*, April 26, 2011, <http://www.balkaninsight.com/en/article/davutoglu-i-m-not-a-neo-ottoman>.

2016年“7·15”未遂军事政变后，土耳其国内由议会制向总统制过渡，招致西方国家对土国内“民主化倒退”的激烈批评。此后，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关系急剧恶化，入盟进程几乎中断，与西方世界开展身份竞争遂成为土耳其外交博弈的一种主导策略。鉴于此，埃尔多安不仅利用奥斯曼帝国文化遗产作为强化突厥语国家一体化和伊斯兰情结的重要载体，更将奥斯曼帝国历史作为土耳其对外交往中道德准则、政治理想和社会文化叙事合法化的重要手段。^①通过唤起人们对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记忆，埃尔多安及正发党希望整合土耳其的各种民族和宗教身份，使土耳其成为一个更有凝聚力的国家。不过，这也导致土耳其国内伊斯兰民粹主义泛滥成势。^②在伊斯兰民粹主义影响下，土国内保守派政治精英认为，土耳其是奥斯曼帝国的“合法继承者”，也是“逊尼派伊斯兰教哈里发国的最后一个家园”，因此“（土耳其）负有保护和领导逊尼派穆斯林的宗教历史责任”。^③在所谓“历史责任”的驱使下，土耳其不断在中东地区推行亲逊尼派外交，谋求成为逊尼派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

与此同时，土耳其周边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有利于土耳其的显著变化。一方面，2016年后土耳其周边地区美俄欧三方势力相对均衡，并未出现“一方独大”的地区性霸权，为土耳其独立行动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权力空间；另一方面，中东变局所产生的“民主化”余波使伊朗、埃及、叙利亚等地区传统强国的实力受损，中东地区国家关系由分化走向竞争。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松动产生了有利于土耳其实施“积极进取”外交的机会窗口，不断激励土耳其采取积极行动扩大地区影响力，并在外交政策中重申其所固有的奥斯曼帝国遗产。^④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埃尔多安及其背后的正发党也希望通过复兴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将土耳其的影响力范围扩大到前奥斯曼帝国领土，特别是巴尔干半岛、中东和非洲地区。^⑤2016年后土耳其外交活动的重点也因此集中于原奥斯曼帝国的领域范围。这一时期，土耳其外交以原奥斯曼帝国领域范围为着力点，以中东、东地中海、高加索—中亚地区热点问

① M. Hakan Yavuz, *Nostalgia for the Empire: The Politics of Neo-Ottomanism*, p. 5.

② 严天钦：《土耳其正义发展党的伊斯兰民粹主义》，《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4期，第38—40页。

③ M. Hakan Yavuz, *Nostalgia for the Empire: The Politics of Neo-Ottomanism*, p. 106.

④ Binnur Özkeçeci-Taner, “Disintegration of the ‘Strategic Depth’ Doctrine and Turkey’s Troubles in the Middle East”, *Contemporary Islam*, Vol. 11, No. 2, 2017, pp. 201-214.

⑤ Pınar Aykaç, “Multiple Neo-Ottomanis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urkey’s (Trans) national Heritage: TİKA and a Dialectic between Foreign and Domestic Policy”, *Turkish Studies*, September 1, 2021, p. 9, <https://doi.org/10.1080/14683849.2021.1970543>.

题为抓手，显示出“四面出击”的特征。

表-1 土耳其外交转折的体现

原奥斯曼帝国领域范围	
东（高加索—中亚）	南（中东—北非—“非洲之角”）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高调介入高加索地区纳卡冲突 • 加速推进突厥语国家一体化进程 • 与伊朗争夺地区主导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军事介入叙利亚、利比亚 • 向“非洲之角”地区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 推进红海、海湾地区的驻军计划 • 支持卡塔尔与沙特争夺地区主导权
西（东地中海—西巴尔干—美欧）	北（环黑海地区—俄罗斯）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与希腊等国爆发东地中海领土争端 • 与欧盟争夺对西巴尔干地区的战略影响 • 与西方国家爆发严重外交冲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公开反对俄罗斯的叙利亚政策 • 调停、斡旋乌克兰东部地区冲突 • 制衡俄罗斯在黑海地区影响力 • 控制黑海海峡，企图掌握地区主导权

如果说 2011 年中东变局后土耳其外交发生“中东化”和“本土化”的转型是对入盟谈判推迟和阿拉伯地区局势动荡“应激式”的被动反应，^① 那么 2016 年前后土耳其外交的再次转变则更加凸显其战略主动性和进攻性。自 2016 年以来，土耳其跃居中东地区第一大经济体，陆军规模在 NATO 中也仅次于美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膨胀使得土耳其愈加深入地介入中东地区事务和周边热点问题，在人权问题、叙利亚问题和难民问题上向美俄欧三方势力公开叫板，甚至不惜动用强硬手段推行冒进的地区政策，出兵叙利亚，试图在叙北部地区建立所谓“安全区”。在利比亚内战中，向利比亚政府军提供军事支持，企图掌握利比亚国内和解进程的主导权。在东地中海地区，不顾欧盟和希腊的警告，坚定支持北塞浦路斯在领土和海洋边界划定上的权益主张，持续推进东地中海油气资源开发计划。针对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在黑海地区的军事对峙，埃尔多安 2020 年 2 月访问乌克兰时高调声明将与乌加强军事合作，并向乌提供价值 2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谋求制衡俄罗斯在黑海地区的主导地位。^② 在高加索—中亚地区，土耳其企图重塑地区国家的“突厥民族”认同，并不断推进突厥语国家间合作，加速突厥语国家一体化进

^① Katerina Dalacoura,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Power Projection and Post-Ideologic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7, No 4, 2021, pp. 1141-1142.

^② 《土耳其战略调整引关注：西方在制裁和拉拢之间寻找平衡》，新华网，2021 年 2 月 14 日，http://www.xinhuanet.com/mil/2021-02/14/c_1211025684.htm。

程，“欲扛起突厥世界的大旗”。^①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土欧关系疏离、土美矛盾凸显。2021年10月23日，埃尔多安突然宣布将美法等10个西方国家驻土耳其大使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又掀起了土耳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新一轮外交风波。在土耳其国内兴起“帝国怀旧”情绪的背景下，正发党近期提出的“积极进取”和“人道主义”外交政策^②构想均是为了在周边地区（尤其是原有奥斯曼帝国领域内）扩大土耳其的影响力，实现土耳其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帝国荣光”。

不过，目前土耳其仍然是一个“中等强国”，对周边地区的过度介入导致其深陷国家实力与大国抱负不匹配的困境，加剧了土耳其外交政策所面临的战略风险。然而，在“帝国怀旧”情绪涌动和周边地缘政治机会的诱惑下，土耳其过高估计自身实力，基本没有注意到周边地区问题可能产生的外溢效应，反而将扩大在原奥斯曼帝国领域范围内影响力的“理想化”目标作为国家外交的优先方向。这不仅导致土耳其被迫卷入周边地区冲突，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也更加紧张。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土叙边境库尔德人出现合流，恐怖主义与民族分离主义逐渐成为土耳其国家安全的威胁。实质上，“四面出击”的外交行为限制了土耳其外交战略的转圜余地，牵制了其中等强国外交的灵活性与平衡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外交所面临的现实危机。

五、结论与讨论

作为奥斯曼帝国历史、地理、文化等遗产的主要继承者，土耳其始终表现出对奥斯曼帝国历史记忆的强烈向往。历史上的“帝国荣光”与现实国家发展中的诸多困境形成强烈反差，助推了土耳其国内的“帝国怀旧”情绪。2015年埃尔多安正式开启总统任期后，正发党对土耳其历史记忆的操纵、对“帝国怀旧”情绪の利用有增无减，甚至借助“帝国怀旧”为其内政外交政策提供合法性依据。在此情势下，土耳其外交重心逐渐转向原奥斯曼帝国领域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2016年前后，土耳其周边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显

^① 《突厥语国家加速一体化进程》，光明网，2021年11月18日，https://news.gmw.cn/2021-11/18/content_35318279.htm。

^② 参见姚琼瑶：《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内涵、目标与前景》，《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4期，第84—99页；李秉忠：《土耳其外交中的“人道主义”取向》，《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4期，第36—43页。

著变化，地区权力格局再次出现松动，为土耳其“扩大在奥斯曼帝国领域内影响力”^①的外交目标提供了地缘政治机会。在“帝国怀旧”情绪和地缘政治机会的共同作用下，土耳其愈发积极主动地介入周边地区事务，试图重塑其大国影响力，导致其在周边地区“四面出击”，外交发生转折。

需要指出的是，“帝国怀旧”兴起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将恢复奥斯曼帝国疆域作为最终目标。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怀旧只是正发党等土耳其保守派政治势力塑造政治话语、维持保守主义国家身份叙事的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引导民众对奥斯曼帝国极盛时期历史的崇拜和肯定，借此重塑土耳其国内保守主义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并为内政外交政策提供合法性依据。

“帝国属于历史，但是，夕阳属于神话。”^②土耳其国内盛行的“帝国怀旧”情绪建立在已经消逝的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基础上，这也决定了土耳其追求“全球性大国”地位、重塑地区影响力的历史夙愿，在现阶段仍然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帝国怀旧”虽然能够通过操纵历史记忆的方式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巩固埃尔多安及正发党的执政基础，但这同样是一把“双刃剑”。首先，“帝国怀旧”情绪将会使土耳其民众对国家社会发展产生过度理想化的预期，然而现阶段土耳其深陷难民涌入、经济通胀、新冠疫情蔓延等多重危机。正发党所宣扬的“2023 政治愿景”与土耳其社会现实的巨大差距或将动摇埃尔多安执政的民意基础。其次，周边国家对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记忆并非都是正面和积极的，亚美尼亚、塞尔维亚等国就曾明确表示对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扩张的担忧，^③因此，“帝国怀旧”情绪的蔓延或将进一步加强这些国家对土耳其的不信任感。最后，“帝国怀旧”情绪致使土耳其外交超出既有地位和实力的限制，在周边地区“四面出击”、盲目扩张，也可能使土耳其出现“战略透支”，并再度陷入四面树敌的困境。

（责任编辑：陈志瑞）

① Binnur Özkeçeci-Taner, “Disintegration of the ‘Strategic Depth’ Doctrine and Turkey’s Troubles in the Middle East”, p. 201.

② 蒋勋：《欲爱书：写给 Ly's 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76 页。

③ 张向荣：《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新变化》，《西亚非洲》，2021 年第 6 期，第 111 页。

of the Soviet Union, eventually went to war. In Russia's perception, Ukraine is not a neighboring country in the general sense, but an ontological security issue threatening its own existence. Since Russia includes Ukraine as a critical part in its own identity narrative, the deteriorating relationship with Ukraine has triggered ontological security threats to Russia. While great-power status is at core of Russia's self perception and international aspirations, it lacks necessary material resources to support the realization of such aspirations.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its aspirations and capabilities has led to its ontological insecurity. For centuries, the constant discord in Russia-Europe relations has shaped Russian strategic culture inclined towards offsetting its ontological insecurity through territorial expansion. In the post-Soviet era, Russia's ontological insecurity has been caused mainly by the expansion of EU's and NATO's spheres of influence onto former Soviet states. The association agreement between Ukraine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as seriously challenged Russia's ontological security. The Crimean incident shows that Putin decided to confront the West for a showdown on the Ukraine issue. Resorting to continuous conflict with the West, Russia has tried to maintain its dominant position in its neighborhood to safeguard its ontological security.

Key words: Russia, Ukraine, identity, ontological security,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e Crimean incident, Putin

“Nostalgia for the Empire”, Geo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a Twist in Turkish Diplomacy

ZENG Xianghong ZHANG Junsu

Abstract: An “imperial turn” is taking place in Turkish studies that emphasize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view of Turkey's diplomatic move of “hitting out in all directions” in its surrounding area after 2016,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urkish diplomacy from two aspects; the shifts of Turkish political thoughts in its domestic domain and the changes in regional geopolitical pattern. Against the backgrounds of the revival of the Ottoman Empire's heritages, the great uncertainty 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environments, and the guidance of conservative political forces, Turkey's domestic nostalgia for the Ottoman Empire has been increasing, which has eventually prompted the gradual shift of the focus of Turkish diplomacy onto the former Ottoman realm (including th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the

Caucasus, etc.). At the same time, the changes in the geopolitical pattern of the region have provided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Recep Tayyip Erdogan and the AKP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the “proactive” foreign policy. Driven by the combination of “nostalgia for the Empire” and geopolitical opportunities, Turkey has actively intervened in regional affairs, trying to reshape its great power influence within the sphere of the former Ottoman Empire. Although “nostalgia for the Empire” has consolidated Erdogan’s ruling foundation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huge gap between history and reality may further exacerbate the existing dilemmas in Turkey’s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Key words: Turkish diplomacy, Ottoman Empire, nostalgia, geopolitical opportunities, Recep Tayyip Erdogan,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Fulfillment of Sovereign Debt Responsibilities

WANG Jinqiang HUANG Meibo

Abstract: Sovereign borrowing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finance development. Historically, however, m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not benefited from the increase in their sovereign borrowing. A notable phenomenon is that most sovereign borrowers have chosen to pay off their debts regardless of financial hardships. The current COVID-19 has not led to a climax of sovereign debt defaults. The study for fulfilling sovereign debt obligations needs to be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rocess. As a power facto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has established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in sovereign lending. Creditor alliances, credit ratings, U. S. dollar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power politics for debtor countries to fulfill their sovereign debt oblig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creditor alliance has changed th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debt negotiators and weakened the influence of debtor countries in sovereign debt governance; the credit rating system has posed a credibility threat to the repayment of sovereign debt; as an international hard currency for sovereign borrowing and debt repayment, the U. S. dollar has utilized its hegemony and encouraged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increase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to improve their debt repayment ability; as the two majo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world,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